

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的分布特点及原因探析

袁从秀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要:民国时期,川康地区近代教育逐步兴起,各类学校数较清末时期有较大地增长,并经历了 1912-1937 年的初步发展、1938-1945 年的兴盛和 1946-1949 年的渐趋衰萎三个时期。学校的空间分布较前亦更为广泛,小学已遍及各行政督察区,但学校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时间上,抗战时期各类学校迅速增加,是川康地区学校发展的兴盛期;空间上,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丘陵区为学校较为密集。纵观民国时期川康地区的学校分布,学校数量较多的是平原丘陵地区、人口数量多而集中的地区、大河流域或公路交通便利的地区、经济状况良好的地区、或邻近重庆、成都两大城市的地区;学校数量少的是山地、高原和少数民族地区。说明自然地理环境、人口数量、交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因素是影响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分布变迁的主要因素。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倡导教育公平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责任,根据区域发展的需求,建立适宜的教育制度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学校布局,以实现教育的公平均衡发展。

关键词: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分布;时空特点;历史因素;现实因素

中图分类号: K25;G40-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80(2016)01-0021-11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和转型期,它是继晚清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变革与动荡的时期。教育作为社会变迁最敏感的神经,既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民国教育是新旧教育的冲撞、新教育的萌芽和生长的硕果,理应成为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开埠,四川的东大门被打开,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进入较为封闭的四川,川康地区^①近代教育逐渐起步。抗战时期,重庆升格为国民政府陪都,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又迎来了一次极佳的发展机遇,实现了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川康地区教育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14BS062);西南大学基本科研项目(SWU1409407)

作者简介:袁从秀,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lsycx@swu.edu.cn)

在民国教育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和鲜明特点,颇具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而学校的数量和分布是直观反映其教育发展状况的量表。本文试以学校的时空分布为视角,以窥民国时期川康地区的学校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一、学校分布的时空特点

(一)学校分布的时段性特点

民国时期的 38 年里,川康地区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校数较清末时期迅猛增加。为能准确地分析川康地区学校分布的时段性特点,在全面梳理该地区学校的基础上,通过对小学、中学、中师、中职到高校的学校数分时段的统计,不难发现,川康地区学校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初步发展期、兴盛期和渐趋衰萎期。

表 1 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校数统计表

阶段	小学校数	中学校数	中师校数	中职校数	高等教育校数	合计
1912-1937年	24474 ^[1]	197 ^{[2][37-43]}	38 ^{[2][3]-44}	40 ^{[2][44-46]}	3 ^[5]	24752
1938-1945年	54049 ^{[4][63,138]}	304 ^{[5][61-70]}	52 ^{[5][71-82]}	67 ^{[5][18-9]}	68 ^[10-12]	54540
1946-1949年	24487 ^{[6][9]}	599 ^[13-14]	104 ^{[11][84-87]}	96 ^[13-15]	24 ^[16]	25310

1.初步发展期(1912-1937 年)

20 世纪初,川康近代教育在“废科举,兴学校”声中艰难起步了。清末时,四川全省各类小学共计 12627 堂,中学 51 堂^[7],中等师范 7 堂^[8],中等职业 14 堂^{[6][20]}。民国建立后,川康地区在经历防区制时代、川政统一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重大变革中,近代教育初步发展起来。据表 1,此时期川康各类学校达到 24752 所,其中小学增加了 11847 所,中学增加了 146 所,中等师范学校增加了 31 所,中等职业学校增加了 26 所,且形成从初等、中等到高等的近代教育体系。

2.兴盛期(1938-1945 年)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心。随着都城西迁重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机关,包括大量的人才纷纷内迁,人口急增,川康地区教育发展进入兴盛期。此时,小学增加 29,575 校,增加比例为 54.72%;中学增加 107 校,增加比例为 35.20%;中师增加 14 校,增加比例为 26.92%;中职增加 27 校,增加比例为 40.30%;高等教育学校增加 65 校,增加比例为 95.56%,是战前川康高校数的 22 倍多。其中增幅超过 50%的是高等教育和小学。高等教育学校数量的猛增,不仅改变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集中于东部大城市的格局,亦奠定了川康地区在战后、直至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

此时川康地区小学和中等教育学校数量的增加,除因大量人口内迁外,还与政府实行国民教育制度直接有关。

3.渐趋衰萎期(1946-1949 年)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高校复员,人口大量回迁,川康地区学校数量大减。据表 1,各类学校总数减少至 25310 所,其中小学减少至 24487 所,几近抗战前的学校数。以通

江县为例,中心国民学校和国民学校的班级数,1946年290班,1947年256班,1948年253班;教职员数,1946年332人,1947年278人,1948年264人;学生数1946年10,556人,1947年11,103人,1948年9,482人^[19]。当时减少的学校主要是小学和高校,又特别是小学。其实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中等教育仍发展良好,与抗战时期相比,中学增加295所,中等师范学校增加52所,中等职业学校增加29所。但到1949年川康地区的中等教育亦呈现出萎缩状态,其中特别是1949年解放前夕,中学减少了130所^{[6]173},中等师范学校数减少了近一半^{[6]314}。因财政困难和内战缘故,一些地方出现了停课停校的状况,学校亦有名而无实。此时高校不仅仅是学校数量的减少,更有学校规模的缩水。国立重庆大学1947年第一学期,教授121人,副教授39人,讲师43人,助教96人,职员121人,教职员共计420人,学生1,959人;到1949年,教职员减少至282人,学生减少至1,575人。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46学年度第二学期教员34人,学生92人;到1949年教员减少至29人,学生减少至57人。私立求精商业专科学校1947学年度第二学期教职员77人,学生315人;到1949年教职员减少至27人,学生减少至108人^[20]。说明1946-1949年川康地区各类学校萎缩趋势明显。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的分布,时段上呈现出非均衡性特点。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各类学校迅速增加,其中特别是高校数量暴增。1938-1945年,川康地区大中各类学校数比抗战前和抗战结束后多约300,00所,成为川康地区学校发展的兴盛期。

(二) 学校分布的空间性特点

以1946年的中等教育学校^{[13]64-87, [14]136-137, [15]62}的分布为参考点,基于:第一,1940年国民教育制度推行后,小学类型多样,有中心小学、国民小学、保国民学校、短期小学、补习学校等,文献资料的记录中,部分县分类记录了学校数,而更多的县只是笼统的小学数量;再之,部分县包含有短期小学,而部分县未包含之,致使小学学校数的区域可比性受影响。第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还只是少数地区、少数人拥有的教育机会,且川康地区的高等教育学校也集中分布于成都和重庆两城市,即使是在抗战时期内迁高校较多的情况下,有高校的县级行政区亦不到四川和西康两省的10%。第三,1946年中等教育学校的数量,是整个民国时期最高峰,分布较为广泛。因此,运用1946年中等教育学校分布分析民国川康地区学校空间的分布是合理的。

通过学校绝对数与相对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较。学校总数由高到低排列前20%左右的县(市)为“发展区”,无中等教育学校的县(局)为“贫乏区”,其余地区则为“一般区”。据1946年中等教育学校的统计,“发展区”县市有6所及其以上学校,“一般区”的县有1-5所学校。

发展区:重庆、成都县、成都市、巴县、江津、宜宾、资中、万县、泸县、合川、涪陵、安岳、资阳、内江、南充、荣县、犍为、遂宁、绵阳、简阳、荣昌、大竹、三台、达县、西昌、永川、璧山、铜梁、邛崃、乐山、富顺、丰都、忠县、渠县、广安、蓬溪、自贡、眉山、江安、隆昌、合江、岳池和康定,共计43县(市)。

一般区:华阳、崇庆、彭县、仁寿、北碚、綦江、南溪、南川、秀山、云阳、垫江、长寿、中江、绵竹、江油、阆中、巴中、灌县、新津、威远、江北、大足、大邑、洪雅、开县、梁山、邻水、蓬安、营山、南

部、武胜、潼南、射洪、广汉、德阳、金堂、宣汉、雅安、汉源、彭山、青神、屏山、珙县、高县、长宁、古宋、古蔺、酉阳、西充、仪陇、盐亭、安县、广元、天全、会理、温江、新都、郫县、夹江、峨眉、沐川、庆符、叙永、石柱、奉节、乐至、什邡、罗江、剑阁、苍溪、开江、通江、茂县、荣经、越嶲、冕宁、盐源、双流、新繁、崇宁、井研、名山、丹稜、蒲江、马边、峨边、雷波、兴文、筠连、纳溪、彭水、黔江、武隆、巫山、巫溪、城口、梓潼、昭化、彰明、北川、平武、青川、万源、南江、芦山、泸定、盐边、宁南、德昌和甘孜,共计 110 县。

贫乏区:旺苍、理番、懋功、松潘、汶川、靖化、九龙、雅江、道孚、丹巴、金汤、泰宁、宝兴、昭觉、宁东、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瞻化、炉霍、理化、巴安、得荣、定乡、稻城和义敦,共计 27 县(局)。

1946 年中等学校中,最多的重庆市达到 84 校,而无中等学校的有 27 县,达 15%,说明中等教育学校空间分布极度不均衡。其中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丘陵区为学校最为密集。

二、影响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分布的主要因素

影响学校分布的因素众多,其中“地理因素是影响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区域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交通等对区域的发展有较大影响。”^{[21]8} 本文旨从自然地理环境、人口数量、交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因素等方面探究其对学校分布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环境

四川和西康位居于我国西南地区,地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等几大地貌单元,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以龙门山—大凉山一线为界,东部为四川盆地及盆缘山地,西部为川西高山高原及川西南山地。

1946 年各地貌区中等学校的平均数:

川西平原区:成都市、温江、成都、华阳、灌县、新津、崇庆、新都、郫县、双流、彭县、新繁、崇宁、眉山、蒲江、邛崃、大邑、彭山、青神、绵竹、什邡、广汉、罗江,共 23 县市,平均学校数为 5.26 校。

盆中方山丘陵区:重庆市、自贡市、资中、资阳、内江、荣县、仁寿、简阳、威远、井研、江北、永川、江津、合川、大足、巴县、北碚、璧山、铜梁、荣昌、洪雅、夹江、名山、丹稜、乐山、峨眉、宜宾、南溪、江安、长宁、泸县、隆昌、富顺、合江、纳溪、大竹、渠县、广安、梁山、邻水、垫江、长寿、南充、岳池、蓬安、营山、南部、武胜、西充、仪陇、遂宁、安岳、中江、三台、潼南、蓬溪、乐至、射洪、盐亭、绵阳、安县、德阳、金堂、梓潼、剑阁、苍溪、江油、阆中、彰明、北川、达县、巴中、开江、宣汉,共 74 县市,平均学校数为 7.01 校。

盆缘山地区:綦江、庆符、兴文、珙县、高县、筠连、叙永、古宋、古蔺、酉阳、涪陵、丰都、南川、彭水、黔江、秀山、石柱、武隆、万县、奉节、开县、忠县、巫山、巫溪、云阳、城口、广元、昭化、平武、旺苍、青川、万源、通江、南江,共 34 县,平均学校数为 3.09 校。

川西南山地区:屏山、马边、峨边、雷波、犍为、沐川、雅安、芦山、宝兴、天全、荣经、汉源、西昌、越嶲、冕宁、会理、盐源、盐边、宁南,共 19 县,平均学校数为 2.74 校。

川西北高原地区:茂县、理番、懋功、松潘、汶川、靖化、泸定、康定、九龙、雅江、道孚、丹巴、金汤、泰宁、昭觉、宁东、德昌、甘孜、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炉霍、理化、巴安、瞻化、得荣、定乡、稻城、义敦,共 30 县,平均学校数为 0.37 校。

平均学校数最多的为盆中方山丘陵区 7.01 校,其次为川西平原区 5.26 校,盆缘山地区 3.09 校,川西南山地 2.74 校,最少的为川西北高原区,仅仅 0.37 校。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数量获得整体增长之时,川西北高原区的学校发展仍滞后,与川康其它地区差距甚大,表现出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作用。

(二)人口数量

学校设置及其分布,与人口数量具有密切的关系。通常来讲,人口越多的地区,学校设置应越多,反之亦然。故人口数量是影响学校分布的原因之一。

据《四川省各县(市)国民教育实施概况》1941 年统计,从区域来看,首先按人口相对数比较,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成都、温江、新都、新繁、郫县、崇宁、广汉,人口密度达到每方公里 500-650 人,是当时四川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①。从该 7 县的人口绝对数看,1941 年成都 164,632 人,温江 164,175 人,新都 159,368 人,郫县 167,722 人,新繁 104,521 人,崇宁 92,081 人,广汉 256,394 人^②。其中,人口最多的是郫县,最少的是崇宁。

这一时期 7 县的学校设置情况^{③④}:

成都:小学 102 所,中学 31 所,中等师范 3 所,职业中学 11 所;

温江:小学 107 所,中学 1 所;

新都:小学 117 所,中学 1 所,职业中学 1 所;

新繁:小学 81 所,中学 2 所;

郫县:小学 133 所,中学 1 所,职业中学 1 所;

崇宁:小学 78 所,中学 1 所,职业中学 1 所;

广汉:小学 159 所,中学 2 所,中等师范 1 所;

学校数最多是郫县,最少的是崇宁。学校数与人口数较好吻合,说明人口数量是影响学校分布的重要因素。

再从全省看,总人口数排列前 10 位的县是:名山(1,294,838 人)、简阳(1,000,390 人)、三台(998,400 人)、泸县(967,359 人)、仁寿(926,246 人)、涪陵(923,200 人)、南充(827,429 人)、中江(820,000 人)、江津(806,089 人)和宜宾(760,981 人)。如按学龄儿童人数计算,排列前 10 位的县是:巴县(177,076 人)、巴中(174,000 人)、中江(150,000 人)、涪陵(142,000 人)、安岳(130,300 人)、宜宾(121,757 人)、渠县(120,226 人)、遂宁(115,904 人)、简阳(100,039 人)和泸县(98,000 人)^⑤。上述县的小学数^⑥在全省的排位分别是:南充 1、泸县 2、宜宾 6、渠县 7、巴县 8、安岳 9、简阳 12、三台 13、中江 19、仁寿 20、涪陵 23、遂宁 25、江津 29、巴中 64、名山 84。除巴中、名山外,其余县的学校数量均居于全省前列。再次说明人口数,尤其是学龄儿童数是学校分布重要的影响因子。

(三) 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是指某地区(地点)与外界进行人员来往(客运)和物资交流(货运)的方便程度^[23]。交通条件对教育的发展、区域间学校彼此的信息流数量、速度、方式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21][4]}。

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形成了以成都为第一中心,东部重庆、南部内江、中部遂宁、北部南充和绵阳、西部雅安为第二中心,并通过成渝公路、川黔干线、川陕干线、川湘干线、川滇干线、川康干线的连接和辐射形成了民国时期川康地区的公路交通网^[24]。其中交通最为密集的是以成都为中心,北至绵阳、东至简阳、南至乐山、西至雅安的区域内。位于交通枢纽的成都、重庆、内江、遂宁、南充、绵阳、雅安 7 县市,其中成都、重庆、遂宁、南充、绵阳 5 县市的中等学校数在川康排列前 20%;内江的中等学校数在抗战前、抗战后排列前 20%;西康省建立后,雅安的中等学校数仅次于西昌位列西康省第二。成都为中心的交通密集区包括第一、二、四、十三行政督察区,以 1946 年的中等学校为例,第一区学校 84 所,第二区学校 62 所,第四区学校 32 所,第十三区学校 34 所,四区共计 212 所,几近占川康此时中等学校总数的 26.5%。而交通落后的第十六区仅 2 所,西康的第四区仅 1 所,西康第五区无中等学校。充分说明交通条件对学校分布产生了重大影响。

再以嘉陵江主流经过的城市广元、苍溪、阆中、昭化、南部、蓬安、南充、武胜、合川、江北为例,与其所在的行政区其它县对比,以 1946 年的中等学校数为对比数。广元、苍溪、阆中和昭化是第十四区,学校数阆中 3 所、广元 2 所、苍溪 1 所、昭化 1 所,占本区学校数的 54%(本区共 9 县 13 所学校);南部、蓬安、南充、武胜是第十一区,学校数南部 1 所、蓬安 2 所、南充 6 所、武胜 2 所,占本区学校数的 69%(本区共 8 县 16 所学校),其中南充是本区学校最多的县。合川和江北是第三区,合川 6 所、江北 4 所,除重庆市外,合川的学校数仅次于巴县(巴县位于长江主流),居本区第二位,江北位于第 4 位。

“发展区”的县市主要分布于四川东路干线(成都—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璧山—重庆—江北—长寿—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川滇东路(重庆—隆昌—泸州—叙永—赤水河—毕节—威宁—昆明)、汉渝路(汉中—大巴山—万源—宣汉—达县—大竹—邻水—江北—重庆)、绵遂支线(绵阳—遂宁)、遂璧支线(遂宁—璧山)、广南支线(广安—南充)等公路交通沿线地区。同时,该区域与金沙江、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流域走向基本一致。再次印证了交通条件着实较强地影响着学校的分布。

(四) 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

一个地区的教育与其经济发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而财政是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晴雨表。

据“四川省各县 1935 年度岁入预算、人均岁入数目”^[25]统计,按县级行政区岁入预算经费由高到低排在前 22 位的是巴县、合川、富顺、南充、江津、开县、泸县、铜梁、渠县、岳池、隆昌、资中、荣昌、遂宁、内江、涪陵、大竹、威远、梁山、眉山、乐山、宜宾。该 22 县的学校数排在四川前 20%的有巴县、富顺、南充、江津、泸县、铜梁、隆昌、资中、荣昌、遂宁、内江、乐山和宜宾

共 13 县。

又据《中兴周刊》记载,1935 年度,县教育经费中,以巴县为最多,28 万多元,荣昌次之,219,000 多元。10 万元以上者有 11 县(南充 19 万多元,江津、万县各 17 万多元,富顺 15 万多元,岳池 12 万多元,开县、铜梁各 11 万多元,隆昌、渠县、江北、泸县各 10 万多元)。5 万元以上者有 31 县(南部、成都、遂宁、大竹各 9 万多元,内江、新都、大足、华阳、眉山、崇庆各 8 万多元,金堂、蓬安、广安、潼南、涪陵、蓬溪、仁寿各 7 万多元,邻水、营山、长寿、简阳、达县、绵阳各 6 万多元,梁山、广汉、中江、云阳、郫县、合江、合川、璧山、宜宾各 5 万多元)^{[26]14}。当年四川全省小学共 16,936 所,普通小学学生 1,086,796 人,又短期小学生 125,590 人,共约 120 余万人。四川人口如以 5,000 万计算,应有学龄儿童 500 万左右,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 70%以上。四川教育区,……以第三区小学教育最为发达,十县共有小学 2,235 所,小学生 262,540 人。第三区小学教育以巴县为最发达,有小学 376 所(约 1165 人有小学一所),有小学生 45,800 人。第十七、十八两区僻在边陲,为最落后,两区 15 县城设治局,小学生总数只 27,000 多人^{[26]14-15}。

表 2 1946 年县市教育经费分组^[27]

经费分组 (千万元)	县市数	县市名称
0-1.9	8	马边,雷波,城口,理县,懋功,松潘,汶川,靖化;
2-3.9	19	崇宁,丹稜,峨边,庆符,兴文,高县,筠连,纳溪,黔江,昭化,北川,平武,茂县,北碚,旺苍,青川,沐川,沐爱,武隆;
4-5.9	23	新繁,井研,蒲江,大邑,洪雅,青神,名山,屏山,珙县,长宁,古宋,彭水,石柱,巫山,巫溪,盐亭,梓潼,广元,江油,彰明,万源,通江,南江;
6-7.9	24	温江,新都,双流,綦江,彭山,夹江,峨眉,江安,叙永,古蔺,酉阳,秀山,邻水,垫江,乐至,什邡,罗江,剑阁,苍溪,阆中,开江,自贡市,仪陇,潼南;
8-9.9	17	灌县,新津,郫县,威远,永川,璧山,邛崃,南溪,南川,长寿,蓬安,营山,西充,射洪,安县,德阳,金堂;
10-11.9	8	荣昌,大足,合江,丰都,奉节,武胜,绵竹,巴中;
12-13.9	12	成都,崇宁,资阳,眉山,隆昌,忠县,大竹,梁山,南部,蓬溪,广汉,宣汉;
14-15.9	8	彭县,荣县,江北,铜梁,乐山,开县,云阳,绵阳;
16-17.9	4	资中,岳池,中江,达县;
18-19.9	5	内江,合川,渠县,南充,遂宁;
20-21.9	4	犍为,富顺,涪陵,三台;
22-23.9	4	仁寿,宜宾,广安,安岳;
24-25.9	1	江津;
26-27.9	3	华阳,简阳,泸县;
28-29.9	1	巴县;
30-31.9	2	万县,成都市;
总计	143	

说明:所有食米价款生活补助费及薪金加成数均已计入。

一个地区总的教育经费和人均教育经费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该地区教育规模的大小。从表 2 不难发现,如成都、万县、巴县等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教育经费相对较多,达 3 亿元左右,而经济落后的地区教育经费不到 2,000 万元。其中教育经费在 1 亿元以上的 52 县市中,1946 年“发展区”有成都市、巴县、万县、简阳、泸县、江津、宜宾、广安、安岳、犍为、富顺、涪陵、

三台、内江、合川、南充、遂宁、渠县、资中、岳池、中江、达县、荣县、铜梁、乐山、绵阳、成都、资阳、眉山、隆昌、蓬溪、荣昌、大竹、忠县、合江和丰都共 36 县；“一般区”有华阳、仁寿、彭县、江北、开县、宣汉、崇宁、梁山、南部、大足、广汉、奉节、武胜、绵竹、巴中和云阳共 16 县。教育经费不足 2,000 万元的马边、雷波、城口、理县、懋功、松潘、汶川、靖化 8 县，除马边、雷波、城口 3 县外，其余 5 县都是“贫乏区”。足以说明学校数量与经济发展和教育经费的直接关系。

(五)政治因素

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教育和学校的发展影响甚大。民国时期对川康地区学校的发展与分布影响的诸多事件中，抗日战争尤为突出。

通过对 1937 年到 1944 年初等教育学校的比较(见表 3),学校数增加了 2.2 万所,比 1937 年增加了 0.88 倍;学生数增加了 159.5 万人,比 1937 年增加了 0.83 倍;教职员增加了 6.7 万人,比 1937 年增加了 1.3 倍。学校数、学生数和教职员数增幅较大,其中 1942 年尤为迅猛,学生数比 1937 年增加了 6177.95 万人,增加了 32.15 倍;教职员比 1937 年增加了 8.5 万人,增加了 1.66 倍;在 1940 年上期尚未实施国民教育之前,全省各县市公立完全小学 2245 所,初小、短小共 2 万所,受教儿童 206.98 万人。到国民教育第一期完成时的 1945 年,中心国民学校比以前的完全小学增加 2733 所,国民学校比以前的初小短小增加 2.35 万所^[46]。

表 3 抗战时期四川初等教育学校的发展情况^[28](单位:万)

时间	学校数	学生数	教职员数
1937 年	2.5	192.17	5.1
1938 年	2.6	200.2	5.3
1939 年	2.57	208.96	5.2
1940 年	2.9	220.9	9.5
1941 年	3.0	220.9	7.5
1942 年	4.4	6370.1	13.7
1943 年	4.75	353.68	11.95
1944 年	4.7	351.69	11.87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教育更是发展迅猛。1940 年重庆市仅有市立小学 5 所,中心小学 12 所,国民基础学校 25 所,计共 42 校。1941 年,推行国民教育,完成镇中心学校 27 所,保民国学校 45 所,代用中心学校 4 所,连同私立小学 60 所,计共 136 校,与保数之比为 20%。1942 年,完成镇中心学校 43 所,保国民学校 90 所,代用中心学校 3 所,连同私立小学 72 所,计共 208 校,与保数之比为 35%。1943 年,完成镇中心学校 52 所,保国民学校 102 所,代用中心学校 3 所,连同迁建区小学 13 所,私立小学 103 所,计共 273 校,与保数之比为 44%。1944 年,完成区中心国民学校 57 校,保国民学校 104 所,代用中心国民学校 3 校,连同迁建区小学 12 所,私立小学 108 所,计共 284 校,与保数之比为 69%。1945 年完成区中心国民学校 57 所,保民国学校 112 所,代用中心国民学校 3 所,连同迁建区小学 11 所,私立小学 111 所,计共 294 校,与保数之比为 72%^[41]。随着学校的建立,重庆的扫盲教育成果显著,“1939 年重庆市共有文盲 7 万多人,其中男性 29,860 人,女性 43,257 人,平均每百户为 429 人。1941 年有文盲

15,800人,进入两个月一期的识字短训班,后经测验合格者为12,340人。到1944年止,有约5万文盲经过扫盲短训班学习,使重庆市的文盲数量显著减少。”^[29]据社会学家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中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0%以上西迁^[30]。人口的内迁刺激了学校数量的增长,而知识分子云集后方,对于后方教育发展亦大有裨益。

三、结 语

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各类学校较清末时期有较大发展,基本形成以新式学校教育为主体、民众教育为辅助的近代教育体制,全方位、多层次、公私并举、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新式教育体系,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蜕变。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教育文化命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家在川践行教育新理念,进行了中国教育道路的有益探索。四川成为西部教育发展的领头羊,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教育的差距。

但是,民国时期川康地区的学校分布极不均衡。从时间上看,1938-1945年学校增加迅速,其中高等教育学校增幅最大。从空间上看,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丘陵区学校较多。而自然地理环境、人口数量、交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因素是影响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分布变迁的主要原因。从自然地理环境看,丘陵和平原地区学校最多,其次为盆缘山地区、川西南山地,学校最少的是川西北高原区。从人口数量看,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校则多。交通方面,长江、嘉陵江、岷江和沱江流域地区以及成渝公路、川滇公路、川陕公路、川鄂公路等沿线地区的学校较多。经济方面,地方经济和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学校相对较多。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西移,川康地区教育获得了一次极佳的发展机会,各类学校数量猛增。其中,川东地区学校发展尤甚,川康地区学校“发展区”东扩南展趋势充分显现。

通过对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原因的探析,我们发现:学校分布的非均衡性既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影响学校分布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在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可以说民国时期川康地区学校的分布影响深远,如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等的差异至今仍存在。平原丘陵区城市成为学校资源配置的中心,而川西高原区的学校仍显不足。所以,国家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充分发挥政府的责任,根据区域发展的需求,构建适宜的教育制度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学校布局,以实现教育的公平均衡发展。

注释:

① 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行政区划发生了三次较大的变化。本文写作的地理范围,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川行政区管辖的范围为准,此时四川共辖2市(成都市、重庆市)、18个行政督察区(另设西康行政督察区),148县2局(金汤、宁东)。1939年西康省正式设置,将原属四川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

的雅安、天全、荣经、芦山、汉源、宝兴、西昌、冕宁、盐源、昭觉、会理、盐边、越嶲、宁南等县及金汤设治局、宁东设治局划归西康省。

参考文献：

- [1] 柯嘉兆.四川初等教育之历史叙述[J].教育视导通讯,1941(19/20):47.
- [2] 教育部统计处编.二十五年全国中等学校一览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3] 教育部.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一览表(1936年)[G].
- [4]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初等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5]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编印.四川省教育文化地图[G]:1941年初版.
- [6]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教育志:上[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 [7]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七编师范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8]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编边疆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37.
- [9] 马廷中.民国时期西康省民族教育的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205-209.
- [10] 战时四川之高等教育[J].新教育旬刊,1939(11):11-12.
- [11]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教育志:下[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11,19-20.
- [12] 涂文涛.四川教育史:上[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484-489.
- [13] 教育部统计处.中华民国三十五学年度全国中等学校一览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14]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四编中学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15]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职业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16]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90-99.
- [17]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教育志:普通教育第一辑[Z].
- [18]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93-894.
- [19] 通江县教育文化体育局.通江县教育志[M].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0:80-86.
- [20] 蒋国昌.重庆教育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461.
- [21] 所晓虹.区域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与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地理学视角下的思考[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5.
- [22]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编印.四川省各县市国民教育实施概况(民国29年8月-30年7月)[G].成都:西南印书局,1941.
- [23] 杨万钟.经济地理学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6.
- [24] 王立显.四川公路交通史: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31-156.
- [25]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M].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B3-B6,C21-C26.
- [26] 四川教育近况[J].中兴周刊,1937,7(176).
- [27] 李双龙.民国四川教育经费探析[D]//四川省统计年鉴(民国三十五年).成都:四川大学,2002:42-43.
- [28] 抗战时期四川的初等教育[A].四川省档案馆(45/219).
- [29] 贾大泉.四川通史:卷七民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620.
- [30] 教育统计[J].教育通讯,1939,2(5).

责任编辑:梁 雁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chools in Sichuan and Xikang Provinc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AN Congxi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uthwest,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education in Sichuan and Xikang provinces gradually risen and the number of various schools in these regions made great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is kind of education experienced 3 periods including initial development from 1912 to 1937, bloom stage from 1938 to 1945 and recession stage from 1946 to 1949. Schools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primary schools were in every administrative superintendence district, but the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s were greatly unbalanced. As for the tim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various school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t was the flourishing ti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n Sichuan and Xikang provinces. As for the space, plain area in western Sichuan with Chengdu as the center and rolling terrain in eastern Sichuan with Chongqing as the center had th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schools. Looking at the distribution of schoo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st of the schools were located in plain and hill areas,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areas, large river basins or transport convenient areas, areas with good economy or the areas close to Chongqing or Chengdu. Few schools were located in mountainous areas, plateaus and the areas where minority lived. Thus, it is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that are the main cause of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schools in Sichuan and Xikang provinc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idering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dvocating the system of educational equity, government ought to create favorabl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how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Government also needs to issue suitable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rrange properly the distribution of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development in indifferent region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fair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chuan and Xikang provinces; distribution of schools;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space; historical factor; reality factor